

栏的中外变译理论比较(焦鹏帅)、变译主体探究(张永中)、变译与全译类型比较(余承法)和变译研究历史梳理(厉平)均是对变译理论研究的深化。

变译理论与翻译改写论的异同*

焦鹏帅

(西南民族大学,成都 610041)

摘要: 尽管对变译理论与翻译改写论的研究者有很多,但对二者的异同、联系作相关研究的人却很少。本文对二者的理论渊源、历史语境、理论框架、目的旨归、业界评价、历史意义等方面进行对比研究,指出二者的异同和联系,揭示中西译论在不同语境、不同思维哲学中的相似发展态势,从而更好地为我国译学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变译理论; 翻译改写论; 差异; 互动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4)01-0085-4

Comparison between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and Translation as Rewriting

Jiao Peng-shuai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China)

Few researches are found on comparison between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and Translation as Rewriting,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researches related to them. Therefor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two theories in terms of their origins, targets, contents, orientations,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cademic comments, significance, etc. It concludes that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both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always develops in an interactive way, thus providing some tip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ranslatology.

Key words: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as Rewriting; difference; interaction

译,易也。易即变也。变有内部之变和外部之变,翻译究竟所变为何,如何而变? 本文选取西方翻译多元系统研究学派中的改写理论与我国学者黄忠廉教授提出的变译理论为研究对象,对两个理论的理论渊源进行历时性梳理,同时对两者的历史语境、理论框架、目的旨归、业界评价、历史意义等诸多方面进行共时对比研究,旨在探寻二者之异同,从而揭示中西翻译研究在不同语境下的嬗变存在哪些差异以及联系。

1 两个理论概述

1.1 翻译改写论的理论渊源

产生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的“翻译改写理论”(Translation as a Rewriting)是由学者安德列·

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其所著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1992)一书中提出的。在该书前言中他指出,“‘改写’(rewriting)泛指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加工和调整过程,改写主要受到两方面的限制: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Lefevere 1992)。“‘改写论’源自 Anton Popovič 的元文本(metatext),他最初使用的是‘折射’(reflection),指对一文学作品的改编,以适应不同的读者,目的在于影响目标读者阅读这个作品的方式。”(黄德先 2009: 77)

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认为,文学是构成文化这个复杂大系统的元素之一。“一种文化、社会是一种文学系统的生存环境。文学系统和该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开放、相互作用,彼

* 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 2013 年度中央高校博士创新基金项目“弗罗斯特诗歌经典汉译本实证研究”(13SZYBS17)、西南民族大学 2013 年度重大项目培育项目“英语世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译介与研究”(13SZD04)及 2013 年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点建设项目“外国语言文学”(2013XWD-S0502)的阶段性成果。

此影响的。”(Lefevere 1992: 14) 从其产生的哲学渊源来看,其思想主要受福柯的关于身体、知识、权力与历史改写之间蕴含的深层社会权利结构思想的影响,其核心是“以后结构的散落性、来源性、差异性、断裂性来代替古典历史书写的总体化、起源化、同质化和连续性原则”(张法 2002: 48)。从其产生的外部学术风潮看,“正值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延异观’兴盛时期,与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兴起的后现代批评理论相结合,跨越文本内部因素,把文本放在社会与历史中进行考察……是从内部走向外部的批评研究,文本范围也从文学扩大到历史学、哲学、文化学、政治学、意识形态等方面”(李龙泉 2009: 6)。这里,勒菲弗尔实质上把翻译和两种文学系统作了类比,从影响翻译行为的外部因素:文化、政治、历史等方面,对翻译的外部成因进行研究。其主要论点是:翻译从来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总是为特定目的或多种目的而服务的,要受到构成社会体系的特定范畴和规范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赞助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影响(同上)。他进一步指出,作为一种文化手段,翻译素材的选择、翻译原则以及翻译目的均由一定的力量所左右。因此,翻译不是对另一文本简单的对等的复制,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对原文进行“改写”的过程,以期平衡两种文化间的各种力量。作为文学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翻译主要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文学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包括批评家、教师、翻译家);文学系统外的赞助人(促进文本阅读、写作或影响对文学改写的势力)和主流诗学(包括文学修辞手段:文本类型、语言符号和文本主旨等以及对文学作用的厘定,即文学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任务就是解释各种写作和改写活动如何受制于某些限制因素,原创和各种改写如何运动”(何绍斌 2005: 68)。

1.2 变译理论的理论渊源

我国佛经翻译时期鸠摩罗什就提出:对于原文之形式不甚拘泥,当增则增,当削则削,以达其要旨为归。(张振玉 1992: 19) 近代严复与林纾的翻译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都不是传统上的完全翻译,都存在着改写、删减等现象,严译更是译中有案,别开新例。1992年王克非在《论严复〈天演论〉的翻译》一文中对严复的翻译进行研究之后,将严复的翻译分为增、删、换、改4种。(王克非 1992: 7) 林译则是任意删削,其中固然有其不懂原语,由合作者转述润色而来,但这是确实存在的翻译事实。当今的报刊文摘对于外文的翻译

则更多的是非全译。这些大量的翻译变体现象说明翻译变体从古至今都存在于我国的翻译实践中。

但是,把翻译变体视为一个独特现象并对其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则始于黄忠廉教授,他1998年在中国译学界第一次提出了翻译变体的概念,并简称之为“变译”。他从现象层、规律层和原理层3个层次对变译现象进行研究,对变译理论作了一个比较明晰全面的阐述。在其出版的《变译理论》(2002)一书中,他从变译理论立说、变译现象说起,对基本理论、变译的实质、变译的系统、变通的手段、变译的方法、变译的体系、变译的单位、变译的章法、变译的过程、变译的机制、变译的特效、变译的规律、变译的标准、变译的范围、变译的价值、变译读者论、变译译者论、变译客体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其核心内容可归结为:所谓变译是指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同“翻译”概念一样,变译既指行为,也指结果。一个理论核心(变通)、4大变译要素(读者、译者、变译和原作)、7种变通手段(增、减、编、述、缩、并、改)、12种变译方法(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释、译写、参译和仿作)和17个研究方向,旨在多快好省,有的放矢地吸收国外信息。(黄忠廉 2002: 19-22) 在《翻译方法论》(2009)中,他进一步将翻译方法论分为翻译实践方法论和翻译研究方法论,针对翻译研究提出“三个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充分和解释充分)和“两个三角”(表-里-值/语-思-文),并提出“方法-历史-理论-学科是翻译方法逐步从实践上升为学科的一般研究历程”(黄忠廉等 2009: 1)。这些都为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提供一系列的方法论支持。

2 两个理论的异同

2.1 历史语境

二者都源于20世纪90年代,都处于以语言为中心的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翻译研究面临窘境之时,二者对翻译研究视域的开拓以及方法论上的变革都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改写论借鉴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以及福柯的知识结构理论,摒弃了结构主义的虚无,开启了“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新视野,使人们从历史、文化、政治意识形态、诗学规范等众多外部参数来对翻译进行研究。

而变译理论则是扭转了当时国内“言必称奈达、必引严复”的单调的语言文本全译研究局面,从众多的翻译现象入手进行理论梳理,归纳总结,

形成一套完备的翻译变体研究体系,开创了我国描写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TS)的先河,同时变译理论中诸多方法论的总结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具有指导作用。可以说,两者是在同一时空坐标下不同学者得出的几乎相似的研究理路,都是对翻译现实的关照,都具有划时代的学科推动意义,所不同的是变译理论兼具描写与规约双重理论属性。

2.2 理论框架

二者的理论框架从宏观角度来看,都不是传统的“忠实”、“背叛”一类的以原文为考察点,而是着眼于原文-译文对等的二元研究方法,都是立论于大量的翻译文本,突出翻译主体——译者对原文的能动性行为。

所不同的是,改写论借鉴文学理论,着重对翻译过程中造成文本变异的外部成因考察,将视角伸向影响翻译行为的社会多重势力,其视角更为宽广。但没有对具体的变异行为和其它相关层面做出系统的总结和梳理,只是在译文的基础上探讨成因,为读者展示了在后马克思主义意义视阈中,社会语境、历史语境中的改写如何对文学领域中的原创性、灵感、臻美等特质产生颠覆。它对影响翻译的因素进行系统性分块处理,是以描述翻译事实、解释翻译现象为目的的。

而变译理论则是从翻译本体出发,从现象层、规律层和原理层3个层面,多角度、全方位地对翻译实践进行系统研究。同时,单纯地从字面上和从内容上看,似乎变译理论包含改写理论,因为变译理论中有一条“改”,所不同的是变译理论从手段、方法论来切入,而改写理论则是以“改”为名,求文学翻译背后隐藏之“实”的成因:究竟是哪些外部势力影响这些“改”,同时译者为了迎合诗学、赞助人以及意识形态都做了哪些“改”。在最新的《变译理论研究类型考》一文中,黄忠廉将变译理论的研究类型总结如下:现象研究与本质研究;过程研究与结果研究;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应用研究与纯理研究;上向研究与下向研究;专题研究与学科研究;笼统研究与具体研究;隐性研究与显性研究;综合研究与分类研究;译介研究与原创研究10种研究类型(黄忠廉2011:101-104)。如果说改写论局限于文学翻译,有比较文学背景,以翻译结果——译文,求其“变因”,那么,变译理论则是以全局的视角,以“变”的核心精神对整个翻译研究进行全方位的综合审视。

2.3 目的旨归

从目的来看,改写论旨在从文学系统所处的

社会宏观系统这一大语境中,揭示造成译文变异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成因。“从表层上看,翻译具有的功能是语言功能,可以视为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行为;而从深层上看,翻译的功能是社会功能,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行为。翻译是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交流、对话、融合、引进和改造,是文化交流的中介和桥梁。”(刘明东2010:127)从研究方法看,改写论属于源自比较文学背景的翻译描写研究派,其目的是对既成的翻译事实进行描写,对翻译现象进行解释,而不是对翻译实践进行指导的应用型理论。

而变译理论则是基于最常见的翻译事实,用描写的手法,把研究上升到归纳总结的规律层、原理层,目的在于“多快好省、有的放矢地吸收国外信息”,更好地为翻译实践、翻译研究服务。它特别适应翻译本科、MTI实际教学需要,也适合当前信息时代下如何选取信息、选译信息,使信息以最快、最优、最有效的方式传达到目标读者。变译理论一方面关注表层的语言转换,同时也研究语言背后的深层文化因素,既包括技巧方法论,也包括翻译策略。“变译方法论的核心是信息摄取,抽汲的是内容,改造的是形式,摄取的策略是变通+(全译)精髓是求‘变’,以变求得译文满足读者的最大需求。”(黄忠廉等2009:1)

2.4 业界评价

从业界反应来看,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改写理论是翻译“文化转向”的分水岭,开启了翻译研究新境界。如杰里米·芒迪高度评价改写理论,宣称“勒菲维尔后期有关翻译与文化的著作是标志着文学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的连接点”(Munday 2001:127)。而批评者则认为,“‘翻译就是改写’表面上是在扩大翻译概念的外延,实际上是在改变翻译概念之内涵,因为‘改写’(re-writing)仍然是一种写作行为,改写者只使用一套语言符号,其行为并非‘语言符号转换’,所以它并不具有翻译特有的属性”(曹明伦2007:126)。还有人认为其夸大了翻译主体译者的作用,容易滋长误译、错译之风,使得翻译流于无标准可依之恶果。也有人认为该理论源自文学翻译的实例,对其它类型翻译影响有限。黄德先为改写论正名,指出人们普遍对其的误读:将文学理论误用为应用翻译理论;误把无意识行为扩展为有意识的主体行动;误把“改写”当作翻译的本质(黄德先杜小军2009)。

变译理论则是一改“以往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多半以原作为中心、为出发点,决定翻译的策略和

微观处理的技法;在变译中则以读者为出发点决定翻译的战略和战术,这是一种本质的差别,是接受理论对翻译的启示”(http://www.amazon.cn/mn/detailmore?showtype=3100&ref=DT&prodid=zhhk019925)。对于变译理论,批评者认为,它是一种完全不能自圆其说,而且有害于正常翻译活动的错误理论,是一种可以不求忠实的另一种理论。我们认为,该批评中的“正常翻译活动”与“不求忠实”是针对传统的以语言为导向的字句对应全译而言的,这一观点缺乏对学科发展前沿问题的了解,缺乏对当前信息时代信息摄取的翻译现实关照,缺乏对为什么翻译人才总是难以胜任市场需要的思考,所以有失偏颇。另外,就“忠实”这一出自我国古典文论的具有高度模糊性的术语而言,它是一个抽象的上位概念,下辖多种具体内涵,如对文本的忠实、对风格的忠实、对语用的忠实、对出版赞助机构的忠实、对文学传统和对意识形态的忠实,等等,另外里面还有一个“度”的问题。变译理论的提出是针对现实中诸多翻译现象的思考,其目的不是要取消“忠实”,相反,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对“忠实”这一模糊标准的丰富和发展。如果说一般而论的“忠实”是一种“应然”的遥不可及的空中楼阁,那么变译理论则将此理想旗帜拉回到“实然”的境地,并且提出实现不同层次“忠实”的具体手段和策略。此外,也有学者指出,“‘变译’与‘全译’概念模糊,‘变译’的形式有随意性之嫌”(徐朝友 2006: 48-51)。其实,黄先生对翻译进行变译与全译划分是为了区别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方法,以翻译事实为依据对众多翻译现象归纳与总结。任何一种新理论都难免会有不足之处,作为批评者,特别是专业人士,应避免主观臆测,这样才有助于整个学科的健康发展。

3 结束语

诞生于20世纪末的中国变译理论和西方的翻译改写论说明,人类的思维在某个时间横截面上趋于一致,都缘于对已有翻译研究模式的不满,都有着对翻译外部环境的考虑。所不同的是一个从文学理论、文化理论入手,将文学翻译与社

会系统进行整合考察,用以描写翻译事实,解释翻译现象;一个是从众多的翻译事实入手,起于语言学,但又不囿于语言学的简单转换,而是不断归纳总结,继而上升为一系列的翻译实践、翻译研究方法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业界对两理论褒贬不一,但在现实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指导,二者都有着广泛的追随者,形成了中西译论里两大别具特色的流派。通过对二者的比较,有助于揭示中西译学理论的发展轨迹,有助于我国译论博采众长、与时俱进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曹明伦. 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 何绍斌. 作为文学“改写”形式的翻译——André Lefevere 翻译思想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5).
- 黄德先 杜小军. 对勒菲弗尔“改写论”的误读[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9(6).
- 黄忠廉. 变译理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 黄忠廉等. 翻译方法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黄忠廉. 变译理论研究类型考[J]. 外语学刊,2011(6).
- 李龙泉. “改写论”的缘由及弊端[J]. 上海翻译,2009(1).
- 刘明东. 翻译选择的政治思辨[J]. 外语学刊,2010(1).
- 王克非. 论严复《天演论》的翻译[J]. 中国翻译,1992(3).
- 徐朝友. 《变译理论》的两大问题——兼与黄忠廉先生商榷[J]. 外语研究,2006(4).
- 张法. 福柯与历史重写[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4).
- 张振玉. 翻译学概论[M].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
-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收稿日期:2013-07-21

【责任编辑 王松鹤】